

吴国华 著

语言文化问题探索

ZC414JX

2 / 17

军事谊文出版社

前 言

这本集子收了我 82 年以来发表的部分论文，其中绝大多数是 89 年以后发表的。这些文章基本上反映了我的研究领域和学术兴趣。从内容上看，可以分为四类：(1) 语言与文化，(2) 语言研究，(3) 文化因素与外语教学，(4) 文化研究。

80 年代初以来，我共发表论文 40 余篇，其中有 10 余篇在俄罗斯、波兰、德国、保加利亚等国的学术刊物和国际学术会议上发表。编选这个集子，当然从文章的质量和价值出发，同时也力求反映我本人的科研范围。鉴于此，集子中选收了几篇用俄文撰写的论文，它们分别发表于俄罗斯《国外俄语》杂志、第七次世界俄语教师代表大会（莫斯科，1990 年）、第八次世界俄语教师代表大会（勒根斯堡，1994 年）等大型国际学术会议和会议论文集。集子中收入的最早的一篇是 1982 年撰写的《试论俄语共性名词》。用现在的眼光看，这篇文章同之后发表的、未曾收入集子的某些文章相比可能还要逊色一些，但它毕竟是我自己在科研道路上留下的足迹。个别论文编入本书时做了些修改和增删。

记得一位俄语前辈说过，文章的写作也是一种“遗憾的事业”。语言科学发展迅速，回过头看过去写的文章，多少令人感到有些幼稚。在俄语文化语言学研究领域，虽写出了几本书和一些文章，但至今乃处在探索思考的阶段，更谈不上有系统、有价值的研究。希望能得到前辈和同行们的批评指正。

在成书过程中，得到了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各级领导和军事谊

文出版社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在这里，我诚恳地向他们致谢。我要特别感谢军事谊文出版社社长王启明先生，承蒙他的力荐和指教，该书才得以顺利面世。

吴 国 华

一九九七年八月十六日于洛阳

目 录

语言与文化	(1)
语言与文化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1)
俄语词的语言国情理论概述	(14)
符号学与语言国情学的关系	(22)
社会语言学的语言观	(31)
文化语义学导言	(36)
浅析俄语色彩词的社会文化意义	(48)
析谈俄语中表动物名词的社会文化意义	(54)
“ТЫ”与“ВЫ”的语言国情学价值	(60)
析谈俄语词的文化伴随意义	(69)
隐喻转义与民族文化	(77)
论词的文化伴随意义特点	(88)
俄汉语词汇文化伴随意义对比问题	(100)
关于对比文化词汇学	(113)
语言研究	(128)
试论俄语共性名词	(128)
从俄语反义词的修辞功能看句法结构	(142)
俄语地名的分析性联系形式	(151)
文化因素与外语教学	(159)
浅谈俄语语言教学与国情	(159)
外语教学中的文化干扰问题	(165)

论俄语交际文化·····	(175)
文化研究 ·····	(185)
从文化哲学看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	(184)

语言与文化

语言与文化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把语言和文化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早在 19 世纪上半叶就已经开始了。应该说,最初研究语言和文化关系的是人类学家。在外语教学界,美国和前苏联的教学法家在本世纪 40 年代就明确提出,在外语教学中要对文化因素给予重视。我国最早研究语言和文化关系的语言学家当首推罗常培先生,他的专著《语言和文化》早在 50 年代初就问世了。但对语言和文化进行系统研究并形成学科,是 60 年代中期以后的事。

1. 相关研究领域

1.1 跨文化交际学(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是 60 年代中期产生于美国的一门边缘学科。它同人类学、社会学、社会语言学、翻译学、传播学、外语教学都有着密切的关系。

跨文化交际学是指:(1)不同民族不同语言间的交际;(2)不同民族同一语言间的交际。它主要研究不同民族在跨文化言语交际和非言语交际方面的问题,研究社会习俗、价值观念、文化传统等对交际的影响及可能造成的障碍;研究交际原则、交际策略和方式等等。

60 年代是跨文化交际学形成时期,美国的一些大学开始开设

跨文化交际学课程,除人类学家外,社会学家、语言学家和教学法家开始对语言与文化、文化与交际作深入研究。

70年代和80年代以来,跨文化交际学进入了成熟和发展时期,王福祥教授认为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国际跨文化交际学会于1972年成立,并在日本东京召开了首届跨文化交际学国际研讨会;

(2)跨文化交际学成为大学的一门课程。目前,美国有200多所大学开设跨文化交际学课程,代表性的教科书有《现代文化人类学读本》、《跨文化交际学选读》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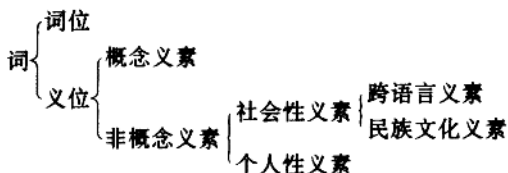
(3)先后出版了该学科方面的理论著作,如霍尔(T. Hall)的《超越文化》、约瑟夫(F. Yousef)的《跨文化交际学概论》等;

(4)跨文化交际学推动了外语教学改革。他们认为,在同外国人交际中,语言和语法错误可以理解,而对交际上的错误则难以容忍。^①

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跨文化交际学有了更大的发展,引起了学术界的极大兴趣。语言学家、社会语言学家、心理学家、教学法家都从各自的角度开展了对语言与文化关系方面问题的探讨。1995年8月在哈尔滨召开了第五届跨文化交际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并在该届会议上成立了中国跨文化交际学学会,胡文仲教授任会长。

我国语言学界、外语学界、对外汉语教学界近年来明显加强了语言与文化的对比研究,尤其对文化与交际、对跨文化交际中的种种问题给予了充分的重视。专著和论文陆续问世,反映了近年来国内外的科研成果。但不容否认的是,目前的研究总的来说还比较零碎,正如胡文仲教授所指出的那样,“第一手材料数量不大,且缺乏系统性”。为此,他建议“在协同作战、适当分工和国内同行合作的基础上,先搜集第一手材料,后作综合研究,不然很容易流于泛论。”^②

1.2 随着语言的宏观研究不断深入,以及联系文化学习语言命题的确立,60年代末70年代初在前苏联诞生了以研究词语民族文化语义为主要内容的语言国情学(лингвострановедение),其核心是词汇背景理论,即:



如,汉语词“红”的概念义素为“血液的颜色”,而非概念义素与社会生活、民族文化相关联:红旗、红眼、红尘(指人世间。有趣的事,俄语在此义上用 белый“白”一词)、红心、红包、红榜等等。根据非概念义素的不同性质可划分为社会性的、跨语言性的和民族文化的。

按照语言国情学理论,词包括词位和义位两方面的内容。义位由概念义素和非概念义素构成,其中非概念义素又称背景义素,其总和为词汇背景。^③可见,语言国情学对义素的理解超出了传统语义学对义素的理解。它把通过联想试验获得的与某词有关的(有逻辑联系的)并能反映该语言民族文化特点的非概念义素也归入了义素的范围。

如果说在美国兴起的跨文化交际学主要研究交际方法、交际途径的预测和解决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交际时可能发生的障碍的话,那么语言国情学则更侧重于研究和揭示存在于语言单位中的文化成分和文化模式。尽管两者在研究范围和任务上各有所侧重,但它们都是把语言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来研究的,都是建立在语言的交际功能和载蓄功能基础之上的,其目的都是为了提高跨文

化交际能力。所不同的是,语言国情学研究的目的是更侧重于外语教学。因此,有的学者直接了当地说,语言国情学是社会语言学在外语教学中的具体反映。

语言国情学最初是在原苏联对外俄语教学中产生的,不排除有政治色彩,即向学习俄语的外国人传授苏联的生活方式和苏联的所谓新文化。尽管如此,其研究方法和视角无疑应该说是正确的。因此,我国国内一些学者建议将 лингвострановедение 译为“文化背景学”或“文化语言学”或“语言文化学”。这在某种程度上也体现了该学科从诞生之日起就具有了一种复杂的性质。有趣的是,苏联 1991 年解体后,在俄语语言与文化研究领域,先后出现了 лингвокультуроведение 和 лингвокультурология (两者均可直译为语言文化学)两个术语,与现有的“语言国情学”共存的局面。

从 1994 年在莫斯科召开的第四届语言国情学国际研讨会以来发表的论著看,俄罗斯学者多采用 лингвокультурология 这一术语。

语言国情学或语言文化学有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两个方面。应用研究主要是把它作为教学论的一个方面,侧重研究不同教学阶段的语言国情教学原则和教材编写原则,以及篇章中的民族文化背景注释等等;理论研究主要侧重于语言各层面上的民族文化特点,例如,语音层、语法层、词汇—语义层、言语行为、审美观、价值观、时空观等等。以词汇—语义层为例,如研究语义结构中民族文化义素、文化伴随意义、引申意义、属种概念和场性分工方面的差异。

例如,汉语在“烹调”这一属概念下有“煮”、“烤”、“煎”、“炸”、“炒”、“熘”、“炖”、“蒸”等等,而俄语中有“煮”、“熏”、“煎”、“烤”、“蒸”等,却没有“炒”、“熘”、“炖”。在“烹调”属种概念上的差异体现了两个民族饮食习制上的差异。^④在场性分工上,如俄语词 птица 指鸟,домашняя птица 指家禽,可见 птица 一词在俄语中有

“家禽”这一义素。

值得指出的是,跨文化交际学和语言国情学与80年代我国兴起的“文化热”并不是一回事。“文化热”主要环绕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再估价,对儒、释、道思想的形成、演变以及给予后世的影响进行探讨研究,但不涉及如何解决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在交际时产生的障碍问题。

1.3 文化语言学是80年代中期在我国兴起的以研究语言和文化关系为主旨的语言学分支学科。目前仍处于探索阶段,有关该学科的许多重大理论问题至今仍无定论。^⑤

我国的语言与文化的研究有着悠久的历史。如训诂学的研究,可以借此研究中国社会;而通过方言调查可以揭示地区间的文化差异,如西汉杨雄著的《方言》一书,这一传统从汉代一直延续到现在。

50年代初罗常培先生出版了《语言与文化》专著,该书可以认为是中国文化语言学的基础,开辟了一条通过分析词语的涵义研究语言和文化关系的新路子。该书主要有6个方面的内容:

- (1)从词语的语源和演变追溯过去的遗迹;
- (2)从造词心理看民族的文化程度;
- (3)从借字看文化的接触;
- (4)从地名看民族迁徙的踪迹;
- (5)从姓氏和别号看民族来源和宗教信仰;
- (6)从亲属称谓看婚姻制度等。

目前,文化语言学研究的主要课题有:语言与文化、语言与社会、方言与文化、语言与民族。代表性著作有:游汝杰等人的《方言与中国文化》,陈建民的《语言文化社会新探》,申小龙的《中国句型文化》和《中国文化语言学》,戴昭铭的《文化语言学导论》等等。

近年来,有学者提出,文化语言学就是语言学,是本体学科。这同西方激进的社会语言学者的观点颇为相似,他们认为,“社会

语言学”中的“社会”是多余的,“社会语言学”就是语言学。^⑥应该说,语言与文化只是理论语言研究的一个方面,因此,有学者撰文指出,把文化语言学凌驾于语言学其他学科之上,是不恰当的。^⑦

关于文化语言学的学科性质以及同社会语言学之间的关系,目前争论最多。总体来看,文化语言学侧重历史现象分析阐释;社会语言学注重实地调查。因此,前者“重解释”,后者“重描写”。此外,二者的研究视角不同,前者用范畴性的视角(如中西差异等),后者用“原型性”的视角分析问题。原型理论可以用于词汇、语义、句法方面的研究。如在研究非标准语时,社会语言学提出了语言变异,包括社会方言和地域方言,它们和标准语之间是派生关系。

2. 沃尔夫假说与语言的世界图景

2.1 “语言与文化”是文化人类学和社会语言学传统研究内容之一。作为社会语言学的研究内容,其典型课题包括“沃尔夫假说”,颜色词、原型、亲属系统等等。在语言、文化、思维关系的理论探讨方面,近年来萨丕尔、沃尔夫、洪堡特等人的思想在我国引起前所未有的兴趣。

语言相对论(即萨丕尔—沃尔夫假说)认为,语言不同,思维也不同。语言决定思维方式。语言不同,对现实世界的认识也不同。也就是说,人们的思维方式和世界观受语言的影响。沃尔夫假说主要是根据英语和印第安语的比较提出的。沃尔夫是一位化学工程师,在麻省理工学院毕业后便到一家火灾保险公司工作,负责调查失火的原因。他发现,导致失火的原因除客观环境外,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理解造成的。例如,人们听到“汽油桶”就会十分小心,怕着火爆炸,但是要是听到“空汽油桶”,就认为是空的,其实里面充满了爆炸气体,比汽油桶更可怕。值得一提的事,1997年5月,洛阳某地就曾有用电焊枪切割“空汽油桶”而引起爆炸,造成人员伤亡

亡的例子。沃尔夫认为,人们这一概念的形成,是由于语言的作用。由此他得出结论:“我们所生活的世界是建筑在人群的语言习惯上的”。^⑧也就是说,使用不同语言的各社会成员所生活的世界是多种多样的许多个世界,而不是具有不同标志的同一个世界。操不同语言的人借助语言来对现实世界进行分类。由于语言不同,对世界的认识也各不相同。例如,在美洲的印第安语中只用一个词来表示昆虫、飞行员、飞机等;沃尔夫甚至说:牛顿如果不是说英语,就会造出迥然不同的逻辑。

日本东方学者中村元在考察语言、思维、文化之间的关系时指出,日本到最近还没有发展出用纯粹的和语来表达哲学,其原因在于纯粹的和语不像梵语或希腊语或德语那样适合于哲学的思索。日语不存在动词不定式,而不定式的特点就是表达抽象的思想。此外,日语中没有把形容词转化为相应的抽象名词的确定构词法。在句法中,日语缺少关系代词,从而使人们用日语进行严密的思考就显得很不方便。由于这些不足,人们很难用日语进行正确的、科学的表述,这在某种程度上妨碍了日本人逻辑的、科学的思维能力的发展。^⑨这里我们无意讨论沃尔夫假说,但沃尔夫当时提出的语言和思维、语言和行为、语言和文化等问题,曾引起大范围的讨论,至今语言与文化的研究者们对此仍然有很大的兴趣。

伍铁平先生认为,从语言是文化的一个要素的角度看,文化与语言具有包容关系;从语言能表现文化内容的角度看,语言与文化之间具有形式和内容关系。因此,“不能把语言与文化关系理解为单向的因果关系或决定被决定的关系。把语言作为世界观,往往容易导致语言具有阶级性的观点,因为一个民族并不存在统一的世界观,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世界观。如果承认不同语言代表不同的世界观,将很难解释语言之间的相互渗透、语言的融合和语言之间的可译性,也无法解释世界上的各民族语言的许多共性,这是语言类型学得以建立的基础。”^⑩

尽管沃尔夫的语言决定论(语言决定世界观)的主张有极端性,但文化对语言的巨大影响是无庸置疑的。语言中的“文化模式”问题无论是对心理语言学家,还是对社会语言学家和文化语言学家的研究无疑是一个促进和启发。尽管我们不能接受语言决定世界观的论点,但语言中的文化模式影响着该文化中个人的交际方式,这是不容忽视的事实。例如,在美洲印第安人的部落中,人们教导孩子,注视年长的人是一种不尊重的表现,听课看着老师自然也是不礼貌的。有一位首次去印第安人居住区工作的白人老师不了解这一点,不明白为什么上课时学生们总是斜视或向两旁看,以为学生对她的课不感兴趣。其实,恰恰相反,孩子们正是表示了对她的尊敬。

2.2 语言是人们创造的,是一定民族精神创造活动的结果。一方面,人对外在世界的感知和认识,人在从事改造物质世界的实践活动时的体验、感受和经验,莫不反映在语言世界中。语言世界是人们所建立的蕴含着人的全部精神创造的关于物质世界的镜像。另一方面,正因为人和物质世界之间还有一个语言世界,人就必须通过语言世界来把握和认识物质世界。

近10年来,前苏联和俄罗斯学者在语言与文化研究领域开始注意研究“语言的世界图景”(языковая картина мира)。“语言的世界图景”主要是指该语言民族对现实世界的认识在语言中的集中体现。换句话说,语言中包含该民族成员对现实世界的认识。“语言的世界图景”是一个民族精神文化在语言中形成的结晶。如俄语中的 далеко 和 холодно 二词,分别包含了俄罗斯人对“远”、“冷”的观念,决不同于日本人对“远”、“冷”的观念。1994年俄罗斯出版了娅科夫列娃(В. Яковлева)的专著《语言的世界图景——时间和空间关系》。可以认为,语言的世界图景将是以后10年语言与文化研究领域的重要课题之一。

3. 基本研究方法和角度

3.1 跨文化交际学、语言国情学和文化语言学并不一般地否定其他语言学派的语言观。比如说,传统语言学把语言看作人类交流思想的工具,结构主义语言学或者把语言看作由能指和所指构成的符号结合而成的形式体系,或者把语言看成由刺激和反应构成的人类行为模式,转换生成语言学把语言看成人类的天赋机制。尽管跨文化交际学、语言国情学和文化语言学这三门学科研究的侧重点不同,但基本上都是从文化学和文化人类学的角度来审视语言的,都是在广阔的人类文化背景中来研究语言的。

美国学者扎雷(Lorand Szalay)和费舍(Glen Fisher)曾倡导采用语义图对词汇的文化内涵作对比的方法。具体做法是让相当数量的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就同一个词作自由联想,然后将联想的内容加以归纳和分类,按照不同人数计算出每一类联想在某词典中所占百分比,再根据不同的百分比绘制图表。例如,一项研究表明,“家庭”一词中“父母”在美国英语中和朝鲜语中所占比重分别为30%和29%,也就是说在这一点上美语与朝语几乎没有差别。美语中“亲眷”在“家庭”的词义中所占比重却很不同。美语中“亲眷”只占7%的比重,而在朝语中却占16%。这意味着在朝鲜人的观念中“亲眷”是“家庭”词义的重要组成部分。词汇研究的另一个角度是研究词的文化内涵。英国传播学家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在他的《关键词:有关文化与社会词汇》一书中曾对130多个富有文化内涵的词逐一分析。他采用的基本方法是追溯词源、研究词义的演变,说明某一词目具有哪些含义,但未作跨文化对比分析。^⑩前苏联学者B·Г·科斯托马罗夫和E·М·维烈夏金提出词汇背景理论,把词义分为概念义素和非概念义素两大部分。从语言国情学的角度看,非概念义素作为词义的一部分,具有同概

念义素相同的地位,属词义范畴。据此理论,他们将社会文化词汇划分为三类:不对应词、背景词和伴随意义词。成语和谚语被归入不对应词和背景词之列,其理由是,成语和谚语在概念意义上同词的概念意义是同构关系。^⑩例如,汉语成语“如火如荼”,其概念意义同“强烈的”,“蓬勃的”。

3.2 语言研究的方法论是建立在一定的语言观和对于本学科研究对象、研究任务以及学科性质的认识基础之上的,而语言观则是这一基础的核心。戴昭铭把文化语言学方法论基础归结为“语言文化属性”。^⑪“语言的文化属性”包括以下几点含义:

(1)语言是一种文化现象,既是民族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又是民族文化的主要建构手段和传承手段。

(2)语言是民族文化精神的表征,语言中蕴藏着民族文化内涵。

(3)各民族的语言有各自的文化属性上的特点,语言结构系统和言语运用表现上的差异与民族文化的差异有一定程度的关联。

作为一个术语,“语言的文化属性”在概念上同申小龙所使用的“语言的人文性”^⑫比较接近。之所以采用“语言的文化属性”这一术语,戴昭铭认为,一方面因为“语言的人文性”,这一术语在申小龙论著的解释和使用中含义不够明确一致,容易引起误会;另一方面是这一术语涉及到申小龙作为方法论提出来的“人文主义”以及作为对立面的“科学主义”,他无意卷入前一时期的两个主义之争的旋涡中去。“语言的文化属性”不易引起误解。在这一概念基础上,文化语言学的总体方法应该是与“解释学”方法相近的“语言文化阐释法”。^⑬

3.3 近年来,在西方学者提出研究“关键词”的基础上,俄罗斯学者在该研究领域又先后提出了以研究“语言文化单位”(лингвокультуре́ма)和语言信息单位(лого́система)为主要对象的、揭示民族文化内涵的方法。所谓“лингвокультуре́ма”,即反映

民族人格和精神的基本语汇。应该承认,每个人心目中的世界是彼此不同的,但由于每个民族都具有能够彼此沟通而广泛共享的知识,每个人又是这个民族文化的塑造物,能反映该语言共同体的共性特征。据此,俄罗斯学者沃罗比约夫(В. В. Воробьев)提出了“民族人格场”这一概念,并采用聚合的研究方法揭示语言的“民族人格场”。^⑥

“логоэпистема”是语言国情学创始人之一科斯托马罗夫院士近年来提出的。“логоэпистема”中的 лого-源于希腊语的 logos(逻各斯)。古希腊语中没有相应于“语言”的词,把语言首先理解为 logos,意为“言说,所说的,言中之物,言中之理”。言主要不是指开口说话而是指说话的根据,说话的道理。在这个意义上,言就是道,就是 logos。“эпис-”意为“认识”,是人脑对客观世界的反映,即信息或知识。

“логоэпистема”集中体现了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地理、历史、习俗、文学等方面的全民族的共享知识。例如,汉语词“阿 Q”,源自鲁迅小说《阿 Q 正传》。对我们来说,即使没有读过鲁迅这篇小說的人,都能够理解该词在具体语境中的意义。这就是“логоэпистема”的一个突出特点。科氏认为,“логоэпистема”应是语言与文化领域值得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对民族语的对外教学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这种研究,无须采用对比的方法。

在我国的外国语言与文化研究领域,多采用对照的方法,因为词汇的民族语义是相对的,是以另一种语言的文化背景为基础的。这种研究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实用性和可靠性,研究结果可直接引入我国外语教学。^⑦

4. 结 语

语言与文化是理论语言学研究的重要方面之一。目前,不同

学者出自不同的目的,从不同的角度探讨语言与文化的关系,形成了许多不同的学术观点和研究视角。这对中国语言学的发展无疑是一个推动。我们认为,语言的产生、发展、变化,同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但也不应因此而过份夸大文化的作用,更不能采用“唯文化论”的立场。^⑩如果试图对语言的每一种变化、每一种现象都要从文化中寻找唯一的答案,那么,这种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将极大地妨碍我们去接近真理。更不能“不恰当地把语言描写同文化语言学对立起来”。^⑪要想深入研究语言同文化的关系,没有对语言本身深刻的描写,也是不可能的。

对语言与文化关系的研究,既要有宏观理论方面的探索,也应有微观方面的、对具体语言单位中文化现象的系统描写。对外语教师来说,后者尤为重要。作为形式主义语言学对立面的语言与文化研究将会逐渐壮大并提高其地位。统括在语言与文化研究范畴之内的各学科概念与研究任务也将在明确其自身性质的过程中不断完善。这些学科自身的系统化、规范化也将有助于其地位的提高。无论是语言国情学的研究,还是文化语言学的研究,“应在现代语言学中占有一席之地并发挥其独特作用,但不能因此而贬低和排斥其他学科”。^⑫

注 释

①⑤⑥参见许嘉璐,王福祥,刘润清:《中国语言学现状与展望》,外研社,1996年,第431-432、434、394页。

②⑩胡文仲:《试论跨文化交际》,载《外语教学》,1992年第2期。

③ Верещагин Е. М., Костомаров В. Г.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ая теория слова. М., 1980.

④⑪参见拙文《文化语义学导言》,载《中国俄语教学》,1997